五代后唐后晋括借史考述

刘金润
（云南大学）
DOI：10.65285/RWYSHKX.V2I6.009

摘　要：五代后唐、后晋政权为筹措军费、犒赏将士、填补府库，常以“括”“借”“率”为名，强制向民间征敛钱帛、粮食、马匹等。本文依据史料，考述括借政策在后唐后晋二朝的演变过程，并归纳出军事需求主导、名实背离、手段暴力化、范围与频率攀升等特点。这套以暴力为支撑的临时性财政搜刮体制，是五代武夫政治在财政领域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五代；后唐；后晋；括借；括率；军事财政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Compulsory Requisition and Borrowing in the Later Tang and Later Jin of the Five Dynasties

Jinrun Liu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 raise military expenditure, reward soldiers and replenish state treasury, the regimes of Later Tang and Later Jin in the Five Dynasties often levied money, silk, grain, horses and other supplies from civilians compulsorily in the name of requisition, borrowing and assessmen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quisition and borrowing policy in the two dynasties, and summarizes its features dominated by military demand, inconsistency between name and reality, violent enforcement, and expanding scope and rising frequency. This temporary fiscal extraction system backed by violence is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military politics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fiscal field.
Keywords: Five Dynasties; Later Tang; Later Jin; compulsory requisition and borrowing; requisition and assessment; military finance

前言

五代上承隋唐，下启两宋，是赋役制度与国家形态发生变动的重要时期。就财政史而言，既往研究多聚焦五代两税、盐铁、商税等常规收入，对五代各政权在非常状态下推行的临时性财政征敛，特别是以“括”“借”“率”为名的括借政策，尚缺乏十分系统梳理。事实上，后唐、后晋两朝的括借频次密集、规模庞大，是观察五代国家与民众关系、理解战时财政运作逻辑的重要窗口。

有鉴于此，本文以后唐、后晋两朝（923—947 年）为时段，以括借政策为对象，先辨“括借”之名实与源流，继而依时间顺序考述后唐庄宗至后晋出帝时期括借政策的演变，最后归纳两朝括借的阶段性特点，以期厘清五代括借政策的基本面貌，为考察五代财政政策的整体结构提供一得之见。

后唐后晋二朝括借史考述

五代时期的括借（也可称为括率），指的是五代各政权出于筹措军费、赏赐将士或填补府库空虚等目的，常以“括”“借”“率”（按比例征收）为名、强制向民间搜括钱帛、粮食、马匹等财物的临时性财政措施。

在“括借”一词中，“括”字应为搜求、搜寻之义，征诸前代史籍中，“括”也曾使用此义，于史有据，如《北史》卷五十五所载“时大括人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其家”，《隋书》卷二记载隋高祖开皇十八年（598 年）惩吴越私造船只之弊，诏令“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三丈已上，悉括入官”，德宗建中三年（782 年）为满足平定藩镇变乱的军费需要，“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搜括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禛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上述史料中，“括”作搜寻之义应当是毫无疑义的。殆至唐朝灭亡，五代继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在五代武夫当政的历史情境下，“借”之于民常为托辞、“率”之于民常为粉饰，加之政权更迭频繁，所借基本上近乎强征，因此，“括”方为括借（括率）政策的核心。概言之，括借名为借贷、率配，实则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无偿征敛，是游离于常税之外的非常态财政手段。

五代括借之举，应始于后唐。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 年），后唐朝廷将伐前蜀，于是诏令括集天下战马，“后唐同光三年六月，诏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辛卯，诏括天下私马，将收蜀故也”，“帝将伐蜀，辛卯，诏天下括市战马”，此次括马，始开五代诸朝括借之风。后唐伐蜀既成，为犒赏伐蜀大军，后唐主帅强制向蜀中富民搜刮巨额钱财，过程严苛、民不堪命，

“魏王继岌、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听以金银缯帛充，昼夜督责，有自杀者，给军之余，犹二百万缗”，犒军之余尚有巨额余钱，这足见括钱的广度与强度。同光四年（926年）二月，邺城军变爆发，“河朔之地告乱者相继”，为保证平叛物资需求，庄宗于同光四年三月下令预借河南府赋税，“戊午，诏河南府预借今年夏秋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此次括马虽托“和市”之名，实则以匿者坐罪相胁，奠定了五代括借“名和市而实强征”的模式；而预借夏秋税之法，亦为后世所仿效。

李从珂叛后唐闵帝之时，也屡屡出现搜刮民财之举，主要是为了犒赏军卒以获取武力支持，如“诏禁军凤翔城下，归明帑，藏无货财，率城中士庶至於鼎釜之类，亦估给。及经、雍、华、陕，率如凤翔，士民之家，不胜其苦”，“（应顺元年三月）十七日，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应顺元年三月）二十日，次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财犒军”“庚申，潞王（即李从珂）至长安，遂雍迎谒，率民财以充赏”。及至李从珂即位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后，亦延续了括借之举，也主要为了资助军用，清泰元年（934年）四月“丙子，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赏军。丁丑，又诏预借居民五个月房课，不问士庶，一概施行……以府藏空匮，于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自绝者相继”“丙子，率河南民财以赏军。丁丑，借民房课五月以赏军”“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数日，仅得数万缗，帝谓执政曰：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从之”“诏卢质而下，率配京城市民及舍屋计”，据《册府元龟》统计，清泰元年“三司计用赏军钱五十万，及率士庶房课搜索，质兼贡物及二十万”，清泰二年（935年）六月“以边军储运不给，诏北面总管，以河东诸州民户，有多积粟、菽者，量事抄借，以益军储”。

此后清泰二年（935年）六月“朝廷以边储不给，诏河东户民积粟处，量事抄借”“甲申，诏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清泰三年（936年）十月“壬戌，诏天下括马，又诏民十户出兵一人，器甲自备”“冬十月壬戌，括马，籍民为兵”“冬，十月，壬戌，诏大括天下将吏及民间马；又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诸道州府县镇，宾佐至录事参军、都押衙、教练使已上，各留马一匹乘骑。及乡射士庶有马者，无问形势，马不以牝牡，尽皆抄借……在京文武百官、主军将校、内诸司使已下、随驾职员，旧有马者任令随意进纳，不得影占人私马。各下诸道准此”。此时后唐朝廷正与勾结契丹的石敬瑭交战，括马、借粟、籍民为兵数事并举，括借与军事动员已合为一体。

石敬瑭在叛唐建晋的战争过程中，也曾因袭使用自后唐开创的括借政策以资军用，这一史实我们从他即位后颁布的赦文可以推知：“晋高祖初即位，改元天福。赦制曰：‘悉力为时，罄财助国，苟不推于恩命，亦何示于赏酬。自举义以来，应借率人户及经抄括商旅资财钱物，委所司明置文籍，候平定之后，当议给还’”。到后晋出帝于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即位后，后晋政权括借之举还常常伴以暴力镇压的手段，括借频率之繁，超越后唐。天福八年（943年）六月“辛未，括借民粟，杀藏粟者”“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分往诸道州府率借粟麦。时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间碓硙泥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天福八年（943年）七月“己丑，诏以年饥，国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余人于诸道括民穀”，天福八年（943年）九月“是月，诸州郡括借到军食，以籍来上，吏民有隐落者，并处极法”，天福八年（943年）十月“庚午，括借民粟”，出帝时期因天灾蝗灾不绝，为满足国家财政，括借之举不留余力，以至天福八年（943年）“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是，在朝廷实行括借政策后，中央官员或地方节度使有时还趁上下括借之机中饱私囊，如杜重威在恒州、定州肆意括借敛财招致民怨沸腾，“朝廷以恒、定饥甚，独不括民穀。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食不足，请如诸州例，许之。威用判官王绪谋，检索殆尽，得百万斛。威止奏三十万斛，余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复满百万斛，来春粜之，得缗钱二百万，阖境苦之”，“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治楼堞为名，率民财以实私藏”，再如景延广于河南括借期间“增率十七万，欲以入己”。

后晋政权与辽政权关系恶化之后，后晋天福八年十二月至开运三年正月（943年12月–947年1月），辽政权先后三次南下攻晋，在此背景之下，括借民财物资成为了后晋政权维持对外战争的重要财政手段，晋出帝石重贵在罪己诏中也承认其时的后晋政权“帑藏不足，则率人资财”，天福九年（944年）正月“诏率天下公私之马以资骑军”“晋天福九年正月，发使于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马。（时契丹入寇，上驻军澶州以御之，故有是命）”“朝廷以廪帑虚竭，军用不给，仍发使郡县，括借民家资财斛斗，海内嗷嗷，不堪其命”，天福九年（944年）四月“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州府括率钱帛，以资军用”，“辛酉，率借民财”，“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开运二年（945年）八月“分遣使臣于诸道率马”“丁丑，括马”。

综上，笔者认为，后唐后晋两朝的括借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军事需求的主导性。两朝括借政策主要是服务于筹措军需、犒赏将士、维持军队等目标，自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借伐蜀之机括集战马，到同光四年（926年）预借河南府租税以平邺都兵变，再到李从珂为兵变夺位与稳定军队多次率配居民家财房课，直至后晋出帝时期（942年–947年）为抵御辽朝南下而大规模括借粟麦、钱帛与公私马匹，军事逻辑大于正常的财政运行逻辑，这正是五代武夫政治格局在财政领域的一方面集中体现；二是名与实的背离。

后唐后晋二朝虽常以“借”“率”等较为温和的名目为托辞，但是“括”作为搜求、强征的核心内涵从未改变，且政权更迭频繁，类似“候平定之后，当议给还”的承诺基本上沦为一纸空文；三是括借手段日趋极端化与暴力化。后唐时期的括借尚以预借赋税、征调物资为主，至后晋出帝时期已发展为“立法甚峻”“隐其数者皆毙之”“吏民有隐落者，并处极法”“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四是括借范围的持续扩大与频率的急剧攀升，括借范围从最初单一的战马征调，逐步扩展至钱帛、粮食。后晋出帝时期还在天福八年六至十月（943 年 6–10 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四次遣使括粟，括粟极其频繁。五是括借与官吏贪腐的共生性。括借之权既委于使臣州县，杜重威、安审信、景延广之徒遂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民众负担倍增。

后唐后晋二朝通过数十年的实践，已经构建起一套适应五代战乱环境、以暴力强制为支撑、覆盖社会财富与人力资源的临时性财政搜刮政策。这套政策不仅成为后唐后晋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财政支柱，且并未随五代政权的更迭而消歇，反而作为一项成型的战时财政遗产，为其后短暂入主中原的辽政权所直接继承。

结语：

综观后唐、后晋两朝括借政策的演变轨迹：后唐同光三年（925 年）伐蜀括马，始开其端；同光四年（926 年）预借夏秋税，继以赋税之预征；李从珂兵变夺位，率敛民财、房课以赏军，括借渐成惯制；入晋之后，石敬瑭于起兵之际因袭其法，至出帝时，内有蝗旱之灾，外有辽军南下，括借遂以“立法甚峻”“封剑授权”的极端形式登峰造极。两朝括借名目虽异，究其本质，则始终是军事压力下的非常态财政征敛，是五代武夫政治在财政领域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唐）李延寿 . 北史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0: 卷 55,1311.

[2]（唐）魏徵 . 隋书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0: 卷 2,30.

[3]（后晋）刘昫等 . 旧唐书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0: 卷 12,226.

[4]（宋）薛居正等 . 旧五代史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5: 卷 32,511−512; 卷 34,543; 卷 46,722,727; 卷 47,745; 卷 48,764; 卷 81,1252; 卷 82,1258,1262,1266; 卷 83,1274; 卷 84,1290; 卷 98,1522.

[5]（宋）王溥 . 五代会要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卷 12,208; 卷 29,459.

[6]（宋）司马光 ,（元）胡三省音注 . 资治通鉴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3: 卷 273,7458; 卷 274,7482,7485,7603; 卷 275,7507; 卷 279,7610,7622; 卷 280,7640; 卷 283,7722,7727; 卷 284,7737−7738.

[7]（宋）王钦若 , 周勋初等校订 . 册府元龟 [M].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06: 卷 484,5495; 卷 510,5800.

[8]（宋）欧阳修 ,（宋）徐无党注 . 新五代史 [M].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6: 卷 7,84,87; 卷 9,108,110,112.

作者简介：刘金润（2003 年 7 月 −）、男、汉族、广东东莞、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经济史。